中国科学报

2014 年 2 月 13 日 星期四 主编:钟华 编辑:韩琨 校对:么辰 Tel:(010)62580711 E-mail:daxue@stimes.cn

校长面对面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

教育改革不能“单兵突进”

■本报记者 陈彬

近些年,随着高校扩招步伐放缓,提高高等教育内在质量的呼声日益高涨。随之而来的,便是针对高教各个层面的改革。

然而,无论是持续多年的高考政策调整,还是曾一度引起众人关注的师德一票否决制、废除公费研究生……每项改革在表达主管部门“办好教育”的强烈愿望的同时,也无不凸显出另一个略显尴尬的现实:几乎所有教育政策的出台,都伴随着公众的质疑和非议,而教育主管部门的一次次努力也没有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不满情绪:我们的改革怎么了?

“我们当然不能奢望每一项改革的出台,伴随的都是一边倒的叫好之声。但现实确实值得我们思考,未来高等教育的改革,我们究竟应该汲取哪些教训?注意哪些问题?”

作为在高等教育领域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老教育人”,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如此表达着自己的担忧之情。

我们的高等教育已经到了一个非改不可的境地,而且这种改革一定要触及深层。只有这样,中国的高等教育才有希望。

以前实行的“单兵突进”式的改革,往往都是亡羊补牢,无法抓到更深层问题、解决主要矛盾,因此需要进行全面改革。

▶王树国

改革定要触及深层

当面对一项改革时,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便是,我们的对象究竟是谁?

对此,王树国坦言,在现阶段,高等教育改革需要我们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高等教育需要一个统一的顶层设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拍脑袋就搞一个评估,再拍大腿搞一个政策。”王树国说,单向的、表面化的改革当然也需要搞,但这远不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全部。

“真正的高等教育改革事关内涵体制机制的建设,是要研究高校和市场的规律,研究高校与政府的关系,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弄清楚的。”王树国坦言,目前在国内的高等教育领域,没有人能说清楚政府与高校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高校与社会的关系同样很难说清,但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理清这些关系对于高校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谁都不去说,引来的是社会的众多非议,而最终的结果便是老百姓不满意、政府不满意,甚至高校自身也不满意。这就如同我们的经济改革一样,一旦进入深水区,有些深层次矛盾就变得无法回避,我们必须加以解决。”王树国说,换言之,我们的高等教育已经到了一个非改不可的境地,而且这种改革一定要触及深层。只有这样,中国的高等教育才有希望。

半途而废不如不作为

提及高校体制机制建设,有一个问题不能被忽略,这便是大学章程的制定。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国内6所重点高校率先公布了大学章程。此事曾一度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就像其他教育事件一样,在公众投向大学章程的关注目光中,赞许者固然有之,更多的依然是不满与质疑。而在采访当中,王树国坦言,自己对此也充满了担心。

“我最担心的是这项工作半途而废。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真的不如不改,因为一项不彻底的改革,可能会比不作为对于社会的伤害还要大。尤其对于大学章程而言更是如此。”王树国说。

他强调,作为大学的“宪法”,大学章程对于高校的重要性毋庸赘言。但大学章程的制定过程本身也需要注意一系列问题,这又与章程本身的定位紧密相连。

“大学章程首先要设计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大学是执行者,政府是主导者。因此,章程须要说清楚,政府为什么要办大学,这是首要的。”王树国说,作为“投资人”,政府不能将办一所大学的原因笼统归于“社会需要”,而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性;其次,章程还要规定政府与大学究竟处于何种关系之中。最后才是大学按照政府的要求,制定内部相应的管理规程。

“一个完整的大学章程一定要有以上三个部分。但在这其中,学校显然无法设计自身与政府的关系,这也不应是学校的职责,而大学和社会的关系也应由政府和高校共同协商。只有第三点才是学校单独能够完成的。”王树国说,换言之,政府在大学章程的制定过程中,既需要明确自身地位,也应明确自身责任。

王树国表示,近些年高校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其根本原因便是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没有理清。“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涉事者的过错,但我们更应反思,现行制度中有没有滋生不良的土壤。至少在现阶段,我们还有太多的制度不规范。”

回到大学章程的问题,王树国表示,虽然目前很多学校都在进行章程编制工作,但这其中有多少是真心在做,有多少又在按照规律办事,这是值得思考的。“如果我们最后的章程不伦不类,甚至千校一面,这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计划性”高教须调整

近两年,在高校的招生、基建,乃至师德师风环节,不断爆出违法腐败等行为。对此,王树国表示,我们同样需要透过表面,看到其中的深层体制机制矛盾。

“举个简单例子,”王树国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国内经济极不发达,老百姓购买物品大多需要凭票购买。当时,在票据方面的违法腐败事件也时有发生,但在解决问题时,小平同志并没有将焦点停留在“查缺补漏”的表面现象,而是敏锐地察觉到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的“社会资源严重不足”的深层次矛盾,果断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时间,社会物品极大丰富,票据问题不复存在。

“我们为什么不能学学小平同志,抓主要矛盾呢?”王树国问道。

他表示,包括相当一部分高教问题的出现,其根源是优质教育资源过少造成的。“如果中国有100个清华,100个北大,老百姓还用为择校而苦恼吗?因择校而产生的招生腐败又从何谈起呢?”因此,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不是“补补丁”,而是思考如何建立一套灵活机制,把生产力充分调动起来,创造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

“应该说,目前教育界的计划经济色彩太浓,高校需要一定的自主权,是为了让学生有更多选择,让学校有更多选择。”王树国表示,目前高校的专业设置乃至各专业的招生数量与社会需求脱节,学生的选择权受限制。这种政府把持主导权的做法,一方面会导致高校与市场的脱钩;另一方面,也使得高等教育对政府产生依赖感。“越这样规划,学生对政府的依赖性越强:我是按政府的规划报考学校和选择专业的,如今我找不到工作,政府为什么不管我了呢?”

如果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的是变革现有计划体制,将决定权交给学校,将选择权交给学生。“新体制下,学校办不好,学生找不到工作,学校自然承担责任。学生一旦不选择某所学校,该学校要么调整政策,主动适应市场,要么被市场淘汰。而无论哪种结果,都比目前这种学校按政府规划办事,与市场完全脱钩,学生就业质量与自身生存毫无关系的现状好得多。”

王树国表示,从某些角度说,高校的人才培养类似于工厂生产产品,产品好用与否,用户反馈的优劣,必须与企业的生死存亡紧密联系。“在现行体制下,我们只求将产品‘卖’出去,至于我们的‘产品’是物尽其用,还是成为摆设,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这种现象必须得到扭转。”

动力在上,需求在下

采访中,王树国丝毫不掩饰对高等教育全面改革的急切期盼。

“这两年,以慕课为代表的新型教育形式已经对全球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国内高等教育更是如此。在信息时代,高教资源再不是一校独有的。你的课讲不好,学生自会借助网络寻找更好的教育资源。我甚至担心有一天,自己的孩子不上我们的学校了,到那时,我们的高等教育该怎么办?”他说。

事实上,这样的担心远不是王树国独有的。北大原校长周其凤在其离职演讲中也曾表示,慕课对于北大而言“也许关系到存亡的问题”。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更是坦陈,这场变革犹如一场海啸。

“如果我们还不反思现行的教育改革,我们很可能陷入危机。”王树国坦言,以前我们实行的“单兵突进”式的改革,往往都是亡羊补牢,无法抓到更深层问题、解决主要矛盾,因此需要进行全面改革。但这种全面的改革一定要是自上而下的,即“操盘手”一定要来自国家层面。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自上而下’,并不是说改革的原动力来自领导的主观意志。事实上,全面改革的切入点一定是社会底层需求。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央已经有了全盘打算。”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针对教育综合改革,并没有宏大的口号,而是直接切入招生改革。对此,有些人觉得有些“不解渴”,但王树国却不这么看。“以招生为切入点推进教育改革,这恰恰体现了国家对于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刻理解,也足见国家对于高教改革的决心。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将看到更多的后续措施。”

“没有人愿意拿刀割自己的肉,企业改制如此,高教改革更是如此。没有中央的强力执行,高等教育的全面改革将寸步难行。”王树国说,目前在高等教育领域,推动改革的民意基础已经足够,我们须要坐下来认真思考,如何通盘考虑,下好这盘关乎中国未来前途与命运的“大棋”。

中国大学评论

冒领科研经费背后的黑洞

■熊丙奇

据媒体报道,不久前,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原执行院长宋茂强利用借用他人身份证、签订虚假劳务合同,冒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科研经费68万元,因贪污罪被海淀法院一审判刑10年半。

宋茂强曾是工信部牵头启动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的专家之一。一名专家走到这一步,实在令人惋惜。值得注意的是,宋套取科研经费的手法并不高明,就是虚列劳务人员的名单领取劳务费,可为什么如此不高明的手法,却能轻易得逞?这暴露出科研经费管理的严重漏洞。

据报道,宋茂强供述,当时分给其团队的经费包括设备费50万元、劳务费150万元。由于他的团队并没有具体任务,通过正常途径没法花出去这笔钱。于是,他就想借用别人身份证把钱套出来。如果其供述属实,一个必须追究的问题是,为何没有“具体任务”,却可以获得高达200万元的科研经费?当一个项目拿到200万,却不知道该用到何处,且到期后必须上缴时,有的人是会动“歪脑筋”的,就是那50万元的设备费,也有可能是为花钱而花钱,买来的设备根本派不上用场。早前有调查显示,我国高校购买的设备,零使用率者不在少数。

另外,在这起案件中,对于科研经费中的劳务费用开支,管理也是一片空白——由项目负责人自己签字即可,换句话说,只要去弄一个劳务合同,再加上自己的签字,就可方便地把劳务费用套现。事实上,近年来类似的做法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并不鲜见,甚至曾有学生向新闻媒体爆料,导师把劳务费用开给他们之后,要求返还——这也是套用劳务费用的方式,只是由于数量相对较少,且比较隐蔽,往往很难察觉。

这些问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首先,团队获得科研经费,其具体任务是什么,必须明确。这本来不应成为问题——申请科研经费时,是要求申请者提交明确的研究内容的,可现在却成为问题。是因为申请项目和作项目研究,成了不相关的两件事。申请项目所列的研究任务,这是为申请到经费,至于申请到经费之后,究竟作怎样的研究,大家还没想明白。

“重立项、轻研究”,是我国当前科研管理体制的一大弊端,根源在于科研的立项、管理,实行行政管理、评价,行政主导科研资源的配置和评价,而没有科研同行评价,于是行政、利益原则,替代了学术原则。在很多高校,只要申请到课题、拿到经费,就被作为教授的业绩。由于一切好处都已到手,接下来的学术研究,就变为折腾经费、炮制成果。与其说这是作研究,不如说是弄资源。

最近,一名民间机构负责人找到我,谈到他和一高校院长合作的故事。这名高校院长要申请一项课题,主动找到这位民间机构负责人要合作。他花了几个月时间,非常投入地写了课题申请书,最后申请到3000万元的课题经费。然而,就在课题项目申请成功之后,这位院长却告诉他,这个课题与他和他的机构没有任何关系了,不过,“出于”对他才华的“欣赏”,学院可以聘他作为兼职副教授。他说,他没有想到高校的院长居然堕落到这种程度。由于课题思路都是他提出的,他很担心这个课题接下来什么都做不出,到头来3000万的经费很可能搞出的只是一堆垃圾。

其次,科研经费的使用,除涉及国际机密外,必须公开透明。在国外,学者申请科研经费,设立方并不会对科研经费的使用提出非常明细的要求,诸如用多少购买设备、多少用于出差,而会给学者比较大的使用经费的自主权。当然,也有基本的原则,即不得在科研经费中列支自己的薪酬(如果学校支付年薪的70%,其余30%可以从科研经费中支付,但总的年薪不得超过额定的年薪),用科研经费作为自己的奖金。就学者而言,根本不可能乱用经费。这是因为,一方面,所有经费的支出情况完全公开,课题设立方有严格的审计,如果经费被挥霍,这名学者将很可能失去再次申请课题的机会;另一方面,获得课题、经费从来不是评价学者学术贡献的指标,这是为学者提供更好的学术条件,以开展学术研究,大家关注的是学术研究过程,这也引导学者专注学术研究,并对自己的学术声誉负责。

2013年,我国在科技研发上的费用增长了8.3%,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科研投入大国。对科研投入的重视,体现了我国科教兴国的决心,但是,科研投入的增加必须有好的科研管理体制配套,不然,科研经费会成为滋生浪费、腐败的温床,反而败坏学术风气。推进科研管理、评价去行政化,建立以学术为本的科研管理、评价新体系,是当务之急。

留校生的幸福年

■本报记者 温才妃 通讯员 曹杰 陆阳 李晨

掸落一年的辛苦与尘埃,在摇曳的红烛、喧闹的爆竹声中马年新春即将接近尾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回家过年所见的也许还是那些菜肴、那些面孔,而留在高校过年却年年有新面孔、新节目,细想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北京语言大学:“小联合国”的民俗新春

拥有大量外籍生源的北京语言大学堪称高校当中的“小联合国”,而春节正是他们展示民俗的好时机。

今年春节北京语言大学共有400余名中外学生留校,其中留学生近300名。为此,校方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民俗“大餐”。

看戏,是古人最常用的庆典方式。30余名北语中外学生走进了湖广会馆,着实过了一把戏瘾。湖广会馆始建于嘉庆年间,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等京剧大师都在此演出过,是仍在运营的北京最大的百年老戏楼。虽然留学生对大戏楼正在上演的折子戏《闹天宫》了解不多,但是看到孙悟空在戏台上把一条金箍棒耍得虎虎生风,忍不住连连鼓掌、大声叫好。

不止是看戏,北京延庆的冰灯展也同样精彩。据介绍,冰灯源自古时农夫、渔民为了弥补照明用具不足,用水桶盛水冻成冰罩,将油灯或蜡烛放入其间,以防被风吹灭。随着时间的推移,冰灯变成了具有一定艺术价值的观赏品。中外学生流连于冰灯晶莹剔透、如梦如幻的神奇世界,争相举起手机、相机,拍下这些艺术珍品。

中国人过年自然离不开写春联、包饺子,用春联、饺子收官寄托了留校生最好的祝福。他们手拿饺子皮,亦步亦趋跟着老师们捏起了小饺子。看着那一个个端正肃立的饺子,留学生的嘴巴乐得合不拢。而另一边,老师则率领着一众留学生,泼墨挥毫书写“马”字以及新春祝语。只见“四海一家”四字潇洒落成,为3天的新春民俗活动注上了点睛一笔。

上海交通大学:马年流行的“私人订制”

在霓虹灯闪烁的夜上海,人潮散去后寒意慑人。而留守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却度过了一个既别致又温暖的新年。

“八骏全图”“马不停蹄”“金戈铁马”…… 这些带着“马”味的名字进入了上海交大年夜饭的菜单。食堂大厨们大显身手,让师生体验了一把“舌尖上的交大”。

然而,真正的亮点隐藏在一些小细节当中。留意桌上放置的打包盒,以及定制菜单的背面,便能发现秘密所在。只见菜单背面印有“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光盘行动,从我做起”等提示语,无不在倡导节约的生活方式,杜绝浪费。

为了烘托吉祥的气氛,学校还特地准备了“电子鞭炮”。有关负责人表示,电子鞭炮不仅能发出普通鞭炮的模拟声,而且能随着响声发出闪光,以假乱真。电子鞭炮既无污染,不会发生意外伤害事故,又能重复使用,节约了开支。

不仅如此,春节期间,每位留校学生都可以领到学校提供的“马年饭票”——50元校内食堂加餐券。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还能领到压岁钱。寒假期间,学校还提供了校内外勤工助学岗位500余个。

送温暖的活动也采取“私人订制”的模式。学校有针对性地对不同需求的学生提供帮困:为全校困难学生提供1250套加绒加厚保暖内衣、1200套棉鞋棉袜手套、300套优质棉衣外套,还为寒假返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总计15万元路费补贴。

南开大学:动静相宜迎新春

载歌载舞是全世界人民欢度佳节的共同方式。在南开大学,马年的春节乐翻了留学生,而中国的留校生则注入了贴合春节真谛的情感关怀。

在南开外籍教师、留学生春节联欢会上,主持人阵容堪称“豪华”。4位主持人来自三个大洲,他们的口音虽然还带着“洋腔洋调”,但是认真的劲头一点儿也不差。为了主持工作,他们专门打印好了主持稿现场朗读,你不会念我来帮,“互帮互助”的主持人让观众捧腹。

多哥留学生阿凡的《冰糖葫芦》不仅带着“京味儿”,还有非洲音乐的律动。巴基斯坦留学生沙兵虽然只学了四个月的汉语,但是一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唱得有模有样。印度留学生高君和巴西留学生方世玉带来的印度舞和桑巴的 “混搭”,让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你方唱罢我来舞,留学生们用各种形式表现了对中国文化的喜爱。

褪去留学生联欢会的热情与奔放,国内留校生更看中春节赋予的人性关怀。

“先生您好,我们给您拜个早年!祝您身体健康!”一句句亲切的问候,萦绕在南开老教授申葆嘉、车铭洲家中。

两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对同学们的到来甚是欣喜,还拿出饮料、糖果招待。申葆嘉从西南联大校史聊到了当今的教育改革,告诫到访研究生代表要时刻关注时事动态、学术前沿,学会融会贯通。车铭洲以文学、艺术甚至数学等学科举例,给他们分析了科学思维方法和做学问的真谛。

通过“南开研究生”微信公众平台报名的研究生张玉川表示,这次拜访让他近距离地接触了南开的历史,感受到学术前辈对晚辈的殷殷期许。他说:“这次‘拜年’让我获益匪浅。”

东北大学:“春节礼包”少不了

红火的福字、吉祥的中国结、喜庆的拜年歌、丰盛的年夜饭……除夕的东大校园充满了 “大年”的色彩和味道。东北大学党委书记孙家学给学生们送上新年“大礼包”。

“孙书记和我们一起吃年夜饭,还送给我们每人一个‘压岁礼包’,有吃的、电话卡,特别是这件‘暖心毛衣’,让我想起小时候妈妈每年给准备的过年新衣服。”生物工程专业2012级本科生陈艳说。

陈艳的老家在贵州毕节,父母都已经下岗,靠打工维持生计。考虑到近60个小时的返乡路途,以及复习英语四级考试的需要,尽管学校给补助了返乡路费,她还是选择留校过年。据统计,今年东北大学100余名学生留校过年,其中80%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新疆、西藏少数民族学生16人。

每年春节学校还特地开放清真食堂,并为新疆学生单独举办春节联欢活动。“家虽在远方,但留校过年依旧温暖。”2011级金融学专业本科生阿力木江·肉孜说出了所有留校新疆学生的心声。

据东北大学校学生指导服务中心张皓介绍,早在去年12月初,学校就提前开展寒假留校困难学生情况摸底统计,建立留校困难学生临时档案和特病学生资助档案,根据学生困难情况,实施按需资助措施。

“学校每年专门制定留校学生工作方案,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爱每一位留校学生,确保他们在学校度过一个安定、祥和、愉快的春节和假期。”东北大学党委副书记熊晓梅说道。